

真实性的分析; (6) 对作品所表达的哲学内涵之评价; (7) 对作者学术渊源的探究; (8) 对作品价值的判定。<sup>①</sup>

### 三 文献目录学的滥觞

考据学与目录学之间的密切联系是显而易见的, 即使在现代社会亦是如此。如阅读者在图书馆浏览群书时, 总是希望图书馆管理员能够提供给他们一定的建议。在同一本书的诸多版本并存时, 图书馆管理员自然会仔细辨识每个版本的优点, 以便为读者提供最恰当的建议。当然, 此时一个有学术头脑及有远见的管理员就会意识到有必要进行考证与比较, 并准备一份方便阅读的版本。

事实上, 西方第一篇文献学理论著作便是由亚历山大图书馆的管理者在这种考证与比较的过程中写就的。亚历山大图书馆的第一任馆长泽诺多托斯 (Zenodotus of Ephesus, 约前 325 - 前 269) 同时也是对古代文本进行系统整理与校勘的第一人, 正是他创造并发明了诸多与文献学相关的学术方法与术语。<sup>②</sup> 与他同时代的稍许年轻的卡利马库斯 (Callimachus, 前 310 - 前 240, 一说前 305 - 前 240), 编撰了第一个带注释的图书馆目录词条库——“百科鸿儒及其著述综合目录”, 其包含了作者信息、标题及内容简介。帕加马王国 (Pergamum, 前 281 - 前 133) 图书馆的竞争者也推出了自己的“百科鸿儒及其著述综合目录”, 只是作者为何人, 至今未知。

① 陈国庆编著《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 中华书局, 1983, 第2页。

② Rudolf Pfeiffer,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From the Beginnings to the End of the Hellenistic Ag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8), pp. 105 - 118.

上述文献学的滥觞工作是在刘向诞生前两百年完成的。值得玩味的是,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 学术事业得以开展的先决条件总是王朝中心地区对书面手稿的广泛收藏。

班固以对刘向之子刘歆贡献的评价作为其对刘向一生的总结, 如下:

会向卒, 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 故有辑略, 有六艺略, 有诸子略, 有诗赋略, 有兵书略, 有术数略, 有方技略。<sup>①</sup>

这段文字并未提及刘向在文献目录学领域的开创性贡献, 因为在人们看来, 刘向所成就的一切是由他所从事的校勘编订工作自然生成的。阮孝绪曾言:

随竟秦上, 皆载在本书。时又别集众录, 谓之别录, 即今之别录。<sup>②</sup>

刘向的《别录》是中国第一个正式的图书目录, 准确地说, 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面的书目, 后人可恰如其分地称之为

① (汉) 班固:《汉书》, 中华书局, 1962, 第1701页。关于由刘歆及其他学者创建的这一开创性的分类系统, 邓骏捷曾在其《刘向校书考论》中承认它的价值与贡献, 但与此同时, 某些史料也反映了时人及后人对刘歆之专制武断的不满。读者请参见邓骏捷《刘向校书考论》, 人民出版社, 2012, 第285 - 301页。

② 任莉莉编《七录辑证》,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第3页。

“分类综合目录”。<sup>①</sup>刘向《别录》的文本组织和布局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更加严格。不幸的是,因唐王朝期间的战乱,《别录》和《七略》已于很大程度上损毁,现存最完整的版本当属姚振宗(1842~1906)的《七略别录佚文》。<sup>②</sup>姚振宗对书名做过如下解释:

其曰七略别录者,谓七略之外别有此一录。<sup>③</sup>

周少川曾对刘向之《别录》和刘歆之《七略》在文献学上的开创性意义进行了如下归纳总结:首先,为书目编纂基本程序的设置奠定了基础;其次,确定了书目的格式;再次,在此之后的目录学家可通过这两个范本习得编纂书目的技巧,并由这些既得经验辨识谬误;最后,后来者可以吸纳刘向和刘歆二人的学术方法、观点及结论。<sup>④</sup>我将要介绍的两个著名的文献目录学家正是追随了他们的脚步。

荀勗曾担任由西晋王室资助的文献目录学项目之主编,这一浩大的工程从274年一直持续至286年,被称为“中经新簿”,

共计29945卷。荀勗于此期间提出了著名的“四分法”,他将经典系统明确地分为四个有机组成部分,即经典性、历史、作者与纯文学。荀勗的编辑工作是以刘向的《别录》作为范本及参照系的。<sup>①</sup>根据出土竹简“汲冢”中的手稿,他此后的编辑工作也是按照同样的路线进行的。<sup>②</sup>

近三百年后,樊逊于557年被委以监督其他十位学者编订文献目录的工作,这一委命堪称重任,其特殊之处在于众学者编订的是用以教育皇室继承人的典籍。樊逊同样参考了刘向开创的先例,他收集了同一文本所有的不同版本,包括藏于王室与匿于民间的。源自私人所藏的3000多个备用/可选择版本得到了充分的利用,樊逊遵循了刘向的文本编订辑录过程,他将之称为“故事”。王重民认为樊逊“专辑刘向在目录实践中所创造出来的经验、方法和理论上的文献记录”。<sup>③</sup>班固著《汉书》时则借鉴了刘歆的《七略》,是谓:

删其要,以备篇籍。<sup>④</sup>

正是刘向与刘歆父子奠定的文献学方法及规范滋养了后世学者。直至今日,我们对周、秦及西汉时期的经学进行研究时,依

① 周少川:《古籍目录学》,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第107页。  
② 姚振宗编校《七略别录佚文》,收录于邓骏捷编校《七略佚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8页。

③ 姚振宗编校《七略别录佚文》,收录于邓骏捷编校《七略佚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8页。

④ 读者请参见周少川《古籍目录学》,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第110~111页;邓骏捷《刘向校书考论》,人民出版社,2012,第257~354页。这两本著作综合评价了刘向的校勘工作及他的《别录》,此两作者均认为刘向所取得的成就促成了考据学、目录学、文献学以及古籍鉴别辨伪学的发展;对于某些学术研究领域则更是造成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如六经的重新排序以及后来演变为“条目”并被运用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中的文献目录性总结。

① 读者请参见(唐)房玄龄等《晋书》卷39,中华书局,1974,第1154页。周少川曾在其《古籍目录学》一书中列名为“中经新簿”的浩大工程进行过简要的概述,读者请参见周少川《古籍目录学》,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第121~122页。

② Edward L. Shaughnessy, *Rewriting Early Chinese Texts* (Albany: Th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31~184.

③ 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华书局,1984,第29页。

④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第1701页。

然倚赖于这些治学途径与法则的引导。<sup>①</sup>

## 第二节 刘歆与古文经学的兴起

当子承父业时，刘歆不得不考虑其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因素，即王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与他对古文本研究的热衷及资助。

刘歆（前46~23）是刘向三个儿子中最年幼，同时也是最有成就的一个。有趣的是，事实上，刘向的长子刘伋才当属家业的真正传承者，他继承了刘氏治《易经》的家学，并以教授《易经》为业。<sup>②</sup>刘歆以其出色的文学才华和诗文记诵的功力打动了汉成帝，年轻时便被委以重任，他负责协助其父刘向进行官书的修订，其父逝世后，遂子承父业，立志完成父亲的宏愿，他在《别录》的基础上创作了《七略》。

父子之间学术取向的差异预示了西汉王朝向东汉王朝转变的时代震荡，《汉书》载：

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时，诏向受穀梁春秋，十余年，大明习。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

① 刘向《别录》、刘歆《七略》以及班固《汉书·艺文志》之间的异同与联系是值得悉心探究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首次成书于1781年，1790~1794年增补至200卷并印刷出版，共涉及10289部著述。由于官方资助的编撰，皇室藏书经阁命学者将其缩略为《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共计20卷，涉及3470部著述，于1782年完成。二者之间的比较在文献目录学界已成为一个普遍的话题。

② 关于刘歆的生平，读者请参见（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第1967~1972页；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第7期，1930年，第1189~1318页；徐兴无《刘向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432~478页；Michael Loewe,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he Qin, Former Han and Xin Periods*, pp. 383~386.

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歆亦湛请有谋，父子俱好古，博见强志，过绝于人。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歆数以难向，向不能非间也，然犹自持其穀梁义。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曰……<sup>③</sup>

值得注意的是，班固特别提到了刘歆与五经博士之间的学术张力，一些学者不屑于与他辩论，另一些则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上述引文中所提到的书信名为《移责让太常博士书》，根据伊娃·宇恩-瓦·淳（Eva Yuen-wah Chung）的考证，“移书”是用来进行正式沟通的书信体裁的名称，刘歆的这封信则为此种“移书”类文体提供了原型。<sup>④</sup>《移责让太常博士书》的“出炉”彰显了刘歆对自身学术造诣及地位的自信。伊娃·宇恩-瓦·淳对这封书信及围绕此信展开的争论做过深入的分析，她提炼出了该文的几个核心观点：首先，重构的“今文”文本并非完整的经典；其次，“古文”文本与“今文”文本的背离证明了后者的不

①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第1967页。

② Eva Yuen-wah Chung, "A Study of the 'Shu' (Letters) of the Han Dynasty (206 B.C. - A.D. 220),"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82), p. 288. 她对刘歆《移责让太常博士书》的翻译及解读见该文第482~495页。

可靠性；再次，“古文”文本是用来校对“今文”文本的最佳参照（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源于刘歆自身编订典籍的经历及其在参与父亲“修书”伟业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最后，“古文”文本与民间的口头传播一致。<sup>①</sup>伊娃·宇恩-瓦·淳认为，刘歆撰此书信的宗旨在于以下三点：

- (1) 保存真正的古籍与失落的经典；(2) 与太常博士合作，挖掘古籍被遗忘的内涵；(3) 执行圣旨。<sup>②</sup>

伊娃·宇恩-瓦·淳对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书》的总体分析是正确的，但忽略了刘歆力推“古文”的时代指向性，以及刘歆主张将“古文”文本纳入经学教育的总体语境。刘歆之所以主张保存和应用古老而完整的礼乐制度，并一再强调圣人执政之道，旨在适应他所处的政治生态环境。在刘歆看来，只有当经典的原始形式得以保存并被学习和研究之时，“治道”才能够盛行天下，而这一切皆依赖于王室的资金支持。

这种对礼乐的关注是“古文”文本得到关注的一个标志。如果说，当时这些学者尚未形成一个固定的学派，但至少他们对“古文”文本的共同关注已然形成了一股思潮。作为当世的研究

者，我们必须在此处停顿片刻，审视今古文之异同。王葆玟对这些关键性的问题进行过深入细致的分析与探究，他指出，今古文之辩主要体现在学派之间，而非文本之上。

王葆玟比较了今文学派内部的鲁、齐两派之别，并研究了二者的始创根基及在西汉时期的发展。鲁学倾向于《春秋穀梁传》，齐学则倾向于《春秋公羊传》。鲁学创建于孔子故里山东，以孔圣思想遗产的保存者和发扬者自居，重点在于研究礼仪类文本和祭祀仪式；齐学则将关注的焦点聚于《诗经》与《尚书》，旨在揭示经典的微言大义，并将之运用于时政，这是稷下学宫的遗产。荀子时期，齐学尤其强调对《春秋》的研究。汉高祖君临天下之后，齐学的经典教育围绕着《诗经》、《尚书》、《易经》和《春秋》展开；鲁学则重视《诗经》、《春秋》、《易经》和《礼记》。就思维方式和哲学内涵而言，齐学的特点是天人合一、阴阳交替与五行相生，尽管有神秘主义倾向，但同样重视经验和逻辑；鲁学则强调道德教诲，侧重于仪式，虽然看似对时策和政治思想史的贡献较少，但就某些方面而言，相比经验主义式的分析，其对政治理念的解释更为直观。

到了西汉中期，一些学者融合了鲁、齐两派的学术观念与治学方法，并加以“后仓之学”。<sup>③</sup>后氏最杰出的学生是戴德和戴圣，他们对《礼记》的整理编订基于“古文”文本。另一个知名的学生是匡衡，他是前31年改革浪潮的中坚力量，这些改革可

<sup>①</sup> 关于“后仓之学”，读者请参见王葆玟《今古文经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第99-107页。

<sup>①</sup> Eva Yuen-wah Chung, "A Study of the 'Shu' (Letters) of the Han Dynasty (206 B. C. - A. D. 220),"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82), pp. 293-295.

<sup>②</sup> Eva Yuen-wah Chung, "A Study of the 'Shu' (Letters) of the Han Dynasty (206 B. C. - A. D. 220),"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82), p. 295. 章权才对刘歆的《移书让太常博士书》进行过类似的分析，读者请参见章权才《刘歆的让太常博士书与经今古文学的第一次论争》，收录于氏著《两汉经学史》，台北，万卷楼，1995，第204-209页。

被视为后氏之学的具体表现。<sup>①</sup>另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许慎(58~147)的《五经异义》，这本著作融合了鲁、齐二学以及“古文”文本的内容。根据现存文本呈现于世的面貌，我们不难发现，许慎借鉴了《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左传》、《大戴礼记》及《周礼》等诸种文本中各不相同的注释与观念，并将之融为一体。正是基于上述事实，王葆玟明确地指出古文经学派发起的回归“古文”的运动并不是回到真正的“古文”文本，而是旨在发扬学派本身的学术与政治观念，具体的结果显现为对一直由今文经学派垄断的官方教育之威胁。在刘歆之前，“古文”文本及注释并未对今文经学派造成这样的威胁，因其只是私下流传，对于经师与儒生而言，这不过是为研习者提供了经典的多种版本，从而方便比较。可见，戴梅可(Michael Nylan)的论断是有据可依的，她认为古今文经学派两大阵营所使用的文本很可能是一致的，就文本本身而言，并无学派之分。<sup>②</sup>无论诸如此类的论断是否完全正确，但当时的文本及注释的确融合了颇多因素，从而呈现多元化的样貌。一些传注可能同时吸收了被今文经学派宗为正统的文本与古文经学派所倡导的注解，学者们即便确实在训诂及

① Michael Loewe, "Kuang Heng and the Reform of Religious Practices—31 BC," in *Crisis and Conflict in Han China*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74), pp. 154–192.

② Michael Nylan, "The Chin Wen/Ku Wen Controversy in Han Times," *Young Pao* 80 (1994): 83–145. 她的文章代表了近几十年的学术新观念，她认为汉代的今古文之争纯属晚清经学家们的捏造，以显示对自己所属学派的忠诚。王葆玟认为今古文经学之争源于诸种学术目的，包括对王室经济资助以及政治资源的争夺。其他相关论述读者可参见李学勤《今古学考与五经异义》，《古文论丛》，远流出版社，1996，第318–328页；Hans Van Ness, "The Old Text/New Text Controversy: Has the 20th Century Got it Wrong?," *Young Pao* 80 (1994): 147–170.

辨伪方面产生了些许矛盾，但问题的症结未必在于文本的差异，派别之争在文本之外。总之，刘歆对“古文”文本的支持引发了今文经学派的危机，尤其是他对《春秋左氏传》推崇备至，加之王莽为《周礼》设周官，政治学意义上的古文经学派就此产生。然而最重要的还在于——鲁、齐学派的融合，后氏之学的普及，“古文”文本的流行——所有的一切为郑玄(127~200)“通学”的生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sup>③</sup> 谶纬之学的出现同时改变了今文经学派与古文经学派二者的治学精神，79年，汉章帝宣诏：“欲使诸儒共正经义，颇令学者得以自助。”

篡位者王莽(前46~23)创立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短命的王朝——新朝，仅存在于9~23年。在此期间，他命学者研究古老的礼仪制度以及与其相关的文本，以实现他的政治目的。与此同时，他自己对古籍也怀揣着一种特殊的研究热情。<sup>④</sup>《汉书·王莽传》载：

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sup>⑤</sup>

看来，他注定要成为一位学者，一位礼仪方面的研究专家，

① 读者请参见王葆玟《西汉经学源流》，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第33~101、383~400页。

② 关于王莽专政的背景，读者请参见 Han Bielenstein, "Wang Mang, the Restoration of the Han and Later Han," in Denis Twitchett and Michael Loewe,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1: The Chin and Han Empires, 221 B.C. – A.D. 2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223–290.

③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第4039页。

一位热衷于“古文”文本的经学家。但若将之放置在更广泛的背景下进行审视,我们便会觉察到截然不同的一面。王莽所关注的文本是《仪礼》,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古文”经典。此外,他还研究《易经》和《左传》,而唯有后者是所谓的“古文本”。为彰显自己对儒学虔诚的信仰,他舍弃了宫廷华服,选择身着儒生所穿的朴素布衣,与那些富裕高贵的堂兄弟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对古文经学派的大力支持显然源于极其现实的出发点,而非指向纯学术性目的。1年,王莽接受“安汉公”的称号;3年,王莽将长女王嬀嫁与汉平帝刘衍,并立她为皇后;6年,汉平帝病逝,王莽立年仅两岁的刘婴为皇太子,自己则代天子处理朝政;9年,王莽借畿纬之势,受符命而摄位,改国号为“新”。

关于王莽篡位称帝的这段历史,最令后人不解的是,在血缘宗法制已然建立的汉代,皇位竟然以“禅让”(实为逼退)的方式传给了一个非刘姓的外人,甚至在王莽篡位之后,他仍然宣称自己继承了尧舜先帝的美德,并以刘氏宗庙的守护者自居。然而,他在掌权期间却处处向刘氏宗亲刘歆请教礼仪方面的事项。例如,刘歆曾参与筹办王莽之女王嬀与汉平帝的婚礼,他就如何举行仪式给出了颇多切实的建议,他还亲自担任新娘的侍陪。此外,刘歆将各种“异象征兆”解释为祥瑞之端,为王莽赢得了民众的支持。身为刘氏宗亲,刘歆对篡位称帝的王莽竟然如此忠心耿耿,极尽能事为其保驾护航。我们在倍感诧异的同时自然应该深入地研究刘歆背叛生父及宗亲的缘故。

鲁惟一(Michael Loewe)解释了刘歆与王莽之间紧密的共生关系,如下:

刘歆与王莽二人所追求的利益在多方面互相吻合。二人在汉哀帝统治时期均已失宠;二人均支持改革派的思想,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可以利用这些想法获得政治上的支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确实对改制心怀真诚的憧憬与信仰。届时,汉平帝的登基为胸有大志的人们提供了实现野心的机会。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刘歆利用了王莽在那个时代强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从而以王莽之名将《左传》推至正统的训诂位,并得以规范敬拜仪式,弘扬他所认为的周代传统礼仪等制。刘歆熟谙于古籍读解与文章书写,他深知如何将文字技巧运用于政治权术之中,这得益于他之前所从事的典籍整理修订工作。

王莽自然欣喜于刘歆对他的支持,一是因为刘歆堪称当时才华横溢的著名学者,二是因为他属汉室宗亲。王莽冀望于刘歆能为其赢得知识界的普遍支持,并向朝廷证明他对皇权的行使是正当合法的。<sup>①</sup>

徐兴无的观点是类似的。他认为,由于刘歆的儒学观始终秉持着一种“向后看”的怀旧姿态,因此,王莽将天象、命理、卜式与政治相融合的做法对于刘歆而言有着天然的吸引力。刘歆进一步将外在的“符兆”与内在的“天命”合二为一,从而发展了利于政治趋向性的畿纬学说。王莽的托古改制对崇尚“古文”自

① Michael Loewe, "The Support for Wang Mang," in *Crisis and Conflict in Han China* pp. 303 - 304.

刘歆来说同样有着致命的诱惑力,它符合刘氏自身的文化理想与人文情怀,与此同时,刘歆也确实坚信改制能够带来百姓与国家安定富强。<sup>①</sup>

班固在《汉书·王莽传》中记载了王莽摄政期间的执政纲领,我们可由此得知为何刘歆大为赞赏王莽在学术和礼仪方面采取的措施,如下:

是岁,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讖、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缪,一异说云。<sup>②</sup>

王莽对周王朝“特殊的兴趣”体现在他精心策划了一系列将自己与周公联系起来的“奇事”。由于周公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贤臣,而且据传他创作了经典,故而若能说服人们相信周公在天之灵庇护并保佑王莽,那么他的摄位便会被认为是合法而正当的。但恰恰在这一点上,刘歆与王莽殊异,刘氏的治学兴趣在于

① 读者请参见徐兴元《刘向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436页。

②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第4069页。关于王莽对古文经学的资金支持以及刘歆对王莽执政纲领的赞赏,读者还可参见黄彰健《经今古文学问题新论》,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2,第87~127页。

真正的《周礼》文本,而非周公。<sup>①</sup>

刘歆将自己的女儿嫁给王莽之子王临,从此两家结下姻亲关系。当王莽正式登基时,他授予了刘歆极高的职位,并托以重任。刘歆为新朝编制了新的历法系统,以“三统”取代西汉的“太初”。但现在看来,刘歆对王莽可能一直是不冷不热的,更多的是自我提升与自我保护,而非发自内心的忠诚。显然,他对汉平帝的离世感到内疚,这使他陷入了与自身价值相左的政治潮流之中。<sup>②</sup> 我们也可断定,他无法按照个人喜好自由地进行学术研究,因为若是得不到王莽在经济与政治上的支持,他便难以立足。刘歆最终选择了叛变王莽。23年,他卷入了一场针对王莽的阴谋之中,这场反叛对恢复刘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阴谋败露之后,他自杀而亡。他晚年将自己的名由“歆”改为“修”,这当然是为了避讳,因为“歆”与王莽新朝的“新”字同音,但

① 关于这一点,读者请参见王微珏《今古文经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第144~149页;Michael Puett, "Centering the Realm: Wang Mang, the Zhouli, and Early Chinese Statecraft," in Benjamin A. Elman and Martin Kern, eds., *East Asian History*,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0), pp. 129-154.

译者注:

[美]迈克尔·普特(Michael Puett)是哈佛大学宗教研究委员会主席,中国历史和人类学教授。他涉猎广泛,对哲学、人类学、历史和宗教等都颇感兴趣,希望将中国学纳入更大的比较研究的框架之内,著有《中国早期宇宙学》、《牺牲与自我神化》以及《早期中国的创新与辩论》等书。

[美]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生于1946年,他于1973年在华盛顿大学获得汉学硕士学位,主攻中国现当代史,之后赴台湾大学华文中心继续研习汉学,1978年在日本东京大学获得中国学博士学位,1984-1985年担任得克萨斯州休斯敦莱斯大学博士后研究员。他曾先后任教于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与普林斯顿大学汉学研究院。他的教学和研究领域包括中国知识和文化史、帝国晚期的科学史和教育史。

② 关于这一点,读者请参见徐兴元《刘向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448页。

我们也可将之视为一个象征性的预言——借助某种虚设的来源助其推翻王莽的政权。<sup>①</sup>

### 第三节 扬雄其人

扬雄（前53~18）是历史上公认的智者与思想家，同时也是擅长写赋的文学家和词典学家。后世学者通常不会视他为经学家，多亏了戴梅可为其正名：“扬雄是宋代之前最伟大的经学家及形而上哲学家。”<sup>②</sup>班固《汉书》载：

赞曰：仲尼称材难不其然与！自孔子后，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孙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此数公者，皆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sup>③</sup>

扬雄作为经学家的身份是值得探讨的，他与刘歆的文献整理工作及王室赞助的文献搜集工作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在词典编纂及注释领域也有着独特的贡献。扬雄生于蜀地，他的赋作模仿了同乡司马相如（前179~前127）之作的风格和结构，赋是司马相如早年最喜爱的文学体裁。<sup>④</sup>扬雄亦颇欣赏屈原的骚体诗，尽管他并不赞同屈原以自杀的方式退出政治舞台。赋这一文学形

① 读者请参见王葆玟《西汉经学源流》，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第398页。

② 姚兴中编《儒学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第741页。

③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第1972页。

④ Michael Loewe,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he Qin, Former Han and Xin Periods*, p. 638. 鲁惟一认为这种模仿是人们虚构出来的，但班固声称他自己就创作赋，读者请参见（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第3515页。

式强调清楚的语言表达，它的功用之一在于取悦那些豢养门士的达官贵人，作赋这一行为似乎不符合扬雄作为严肃学者身份。班固在《汉书·扬雄传》中描写了他的这种自相矛盾的特质，如下：

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亡为。嗜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徽名当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自有大度，非圣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顾尝好辞赋。<sup>①</sup>

他作为较早时代学者中的一位，竭力支持以古文文本为主导的学术传统了无痕迹地转向以今文文本为主导的新传统。然而这一评判基于扬雄对分类的负面观点。王青对扬雄某个引经据

①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第3514页。《汉书》中扬雄的传记被两个部分，一部分见于第3513~3556页，另一部分见于第3557~3585页，其中了他的七篇赋作中的一部分，因此其传记的篇幅也得到了相应的扩展，它已被维（David Knechtges）翻译并详细注释，读者可参见 David Knechtges, *The Biography of Yang Xiong (53 B.C. - A.D. 18)* (Tempe, AZ: Center for Asian Studies,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1982)。读者还可参见 Michal Nylan, *Yang Xiong and Pleasures of Reading and Classical Learning in China* (New Haven, CT: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11), pp. 24-31. 她在此文中还介绍了扬雄同辈人的生平著作。此外者还可参见王青《扬雄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译者注：

〔美〕康达维（David R. Knechtges），生于1942年，华盛顿大学东亚系中国教授，他主攻汉赋和六朝文学，对这一长期被西方学者所忽视的研究领域做出大贡献，使得这一领域重新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兴趣，他最重要的成就首次全翻译了《文选》。他于2006年被选为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2014年荣获第八届图书特殊贡献奖。

经学走向衰颓，王充的激进派思想逐渐为人所知，并大受欢迎。<sup>①</sup>

### 第三节 许慎与词典编纂学发展的盛极之鼎

我曾在前文中提及一些在文字学方面颇有钻研的文学家，但他们的成果仅限于四字式的识读性启蒙书籍，间接地解释了字义，而且过于简单。这一四字式的形式回应了早期的诗歌文本特征，同时也反映了诗人与学者灵魂深处的相通。现举一例为证：

苍颉作书，以教后嗣。幼子承诏，谨慎敬戒。勉力讽诵，昼夜勿置。苟务成史，计会辨治。起等缺群，出尤别异。初虽劳苦，卒必有意。<sup>②</sup>

这种形制和篇幅长短必定流行于那一时期。

上述所引的识读性启蒙书籍自然难以涵盖对某一字词精确的

① 拉弗·德·克里斯皮涅 (Rafé de Crispigny) 《自汉代晚期至三国时代的文献学词典》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Later Han to the Three Kingdoms, 23-220 AD), 布瑞尔出版社, 2007, 第807页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7, p. 807)。可以肯定的是, 乾隆时期的在朝学者纪昀 (1724-1805)、惠栋 (1697-1758)、王鸣盛 (1722-1797)、钱大昕以及杭世骏 (1696-1773) 等人都认为王充对古代圣帝, 如孔子、孟子和韩非进行了极其尖刻的贬低, 但这些当朝大臣也只是追随皇帝的观点。故而对他们的看法不必加以重视。读者可参见褚问鵬《王充〈论衡〉研究》, 台北, “中央”图书出版社, 1974, 第27-35页。

② 读者请参见 <http://text.org/library.pl?if=gb&res=1607>。

定义。<sup>①</sup>《尔雅》则算得上难得一见的例外, 它整合了公元前3世纪前后人们对某些字词的定義和用法。事实上,《毛诗》也可被看作一种释义的文本。据传,《尔雅》为周公所著,在唐代被奉为经典,后被纳入“十三经”。它包含19个部分,并列有同义词条目。<sup>②</sup>《尔雅》虽堪称经典,但许慎的《说文解字》则具有某种划时代的革新意义,因其将释义方法与诗论与诗歌分离开来,从而将研习的重点由记诵转向诠释,将文字从特定的文章段落中抽取出来赋予它们以专门性的内涵。<sup>③</sup>此外,它还将文字释义置入成人阅读的情境之中,以更为复杂、难度系数更大的文本作为例句释读文字,故训诂释读不再只囿于孩童蒙学的范畴。许慎的《说文解字》开拓了一个崭新的领域,他始创构架了关于“六书”的新理论,将每个汉字的结构分解为字形、语音和语义这三个部分。条目的排序不再按照原先的字义分类,而是依据偏旁部首首进行排列。

许慎 (约58~147) 出生的年代今文经学正盛行,他目睹了这一经学学派与潮流的兴起,见证了官方诠释以及宏大的宇宙理

① 读者请参见何明勇、景鹏编著《中国词典学:从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1911年》 (Chinese Lexicography: A History from 1046 BC to AD 1911),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8, 第27-28页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27-28)。

② 罗杰·格瑞特雷克斯 (Roger Greatrex):《西汉早期同义词:〈苍颉篇〉抄本》 (An Early Western Han Synonymicon: The Fuyang Copy of the Cang Jie Pian), 收录于乔吉姆·恩沃尔 (Joakim Enwall) 编《简帛研究:古尔·马尔姆奎斯特70岁生日纪念文集》 (Outstretched Leaves on His Bamboo Staff: Studies in Honour of Göran Malmquist on His 70th Birthday), 东方研究协会, 1994, 第100页 (Stockholm: Association of Oriental Studies, 1994, p. 100)。

③ 读者可参见科布林 (W. South Coblin) 的文章, 收录于鲁惟一 (Michael Loewe) 编辑《早期中国文本》 (Early Chinese Texts), 美国东亚研究所出版社, 1994, 第94-99页。

论与之相结合的情状。不幸的是,受到古文经学的冲击,今文经学派逐渐式微,朝野上下的争论与质疑也此起彼伏。曹褒继承了其父曹充的衣钵,曹充是汉光武帝时期的五经博士之一,专攻《礼记》,他年轻时曾为朝廷重建礼仪,是继叔孙通之后又一位将经学运用于朝纲仪礼方面的学者。正因如此,他十分崇敬叔孙通,也借鉴了叔孙通的一些治学经验。《后汉书》载:

诏召玄武司马班固,问改定礼制之宜。固曰:京师诸儒,多能说礼,宜广招集,共议得失。帝曰:谚言作舍道边,三年不成。会礼之家,名为聚讼,互生疑异,笔不得下。昔尧作大章,一夔足矣。<sup>①</sup>

鲍则岳(William G. Boltz)曾言:

类似于上述这种倨傲轻蔑的姿态持续了几十年,它与后宫嫔妃及太监等遵循的制度有关。<sup>②</sup>

直到120年,朝中氛围才有所改观。对于此类学者的辱蔑和歧视也才逐渐转变为尊重和信任,至此之后,朝廷开始接纳这样的学

①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2000,第1203页。关于这段历史,读者还可参见拉弗·德·克里斯皮涅(Rafé de Crispigny)《自汉代晚期至三国时代的文献学词典》(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Later Han to the Three Kingdoms, 23-220 AD),布瑞尔出版社,2007,第35-45页(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7, pp. 35-45)。

② 读者可参见鲍则岳(William G. Boltz)的文章,收录于鲁惟一(Michael Loewe)《早期中国文本》(Early Chinese Texts),美国东亚研究所出版社,1994,第430页。

者,并希望他们能够为经学发展做出贡献。<sup>①</sup>尽管许慎的《说文解字》成书于100年前后,但他的儿子许冲上呈给皇帝观阅。<sup>②</sup>

史书对许慎生平的记载甚至比王充传更加简短,而且被随意地与一些末流之辈并置在一起,见下文:

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笃,少博学经籍,马融常推敬之,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为郡功曹,举孝廉,再迁除浚长。卒于家。初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义,又作说文解字十四篇,皆传于世。<sup>③</sup>

正如前文所述,许慎一直静居家中,潜心著书,直至晚年他的书才得以面呈圣上,故在时人看来,许慎是一位纯粹的经学家,而非词典编纂学家。他为人所称道的著述是十卷本的《五经异义》,现仅存100多篇断章,勉强可以凑成三卷。<sup>④</sup>据许慎之子许冲在《说文解字》前言里的记述,其父曾为贾逵(30~101)

① 罗伊·安德鲁·米勒(Roy Andrew Miller)详细描述了这一时期经学氛围的转向以及朝廷对经学家态度的转变,读者可参见他的博士学位论文《〈说文解字〉问题研究》("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Shuo wen chieh tzu"),哥伦比亚大学,1958,第3-26页(Columbia University, 1958, pp. 3-26)。

② 王蕴智:《中国的字圣——许慎》,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第19页。

③ 王蕴智:《中国的字圣——许慎》,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第19页。拉弗·德·克里斯皮涅(Rafé de Crispigny):《自汉代晚期至三国时代的文献学词典》(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Later Han to the Three Kingdoms, 23-220 AD),布瑞尔出版社,2007,第910页(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7, p. 910)。读者还可参见陶方琦编《许君年谱》,诸可宝编《许君年谱》,收录于北京图书馆编《汉晋名人年谱》(三卷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第277~319,321~399页。

④ (清)陈寿祺疏证,曹建墩点校《五经异义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9647~9716页。

门生,他自84年便受教于贾逵门下,接受过古文经学派的学术训练,深受古文经学派的影响,故而他在著书立说的过程中时常援引贾逵的观点。<sup>①</sup>

罗伊·安德鲁·米勒(Roy Andrew Miller)认为许慎是一位观点独特、想法独到的古文经学家,并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sup>②</sup>而许慎的作品之所以流传甚广与郑玄是分不开的。郑玄(127~200)是一位颇具反叛精神的经学家,被后人盛赞为“通儒”,他通晓古今两派,博览群书,不受自家门派的局限。郑玄找出了许慎著作中的一些谬误,并一一驳斥。这种以许慎作为靶心加以射击的做法,实际上从另一个侧面推动了其著作的传播。<sup>③</sup>

此外,许慎在学术上的忠诚和坚守反映了古典时期师承关系的纯粹性。当代学者顾涛曾在《段注论〈说文〉与〈仪礼〉今古文之关系析疑》一文中论及此问题。顾涛认为,尽管许慎也受到了今文经学派的影响,但归根结底他还是一位古文经学家,他对古文经学派的忠守是显而易见的,更勿论他与郑玄在众多学术观点上的差别。<sup>④</sup>

据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五经异义》探讨了25个独立的主

① 关于这一断言背后的推理,读者可参见王蕴智《中国的字圣——许慎》,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第19页。

② 罗伊·安德鲁·米勒(Roy Andrew Miller):《许慎的〈五经异义〉》(“The Wu-Ching I-I of Hsu Shen”),收录于《塞内卡纪念文集》,1977~1978,第4页(Monumenta Serica, 1977~1978, p.4)。

③ 罗伊·安德鲁·米勒(Roy Andrew Miller):《许慎的〈五经异义〉》(“The Wu-Ching I-I of Hsu Shen”),收录于《塞内卡纪念文集》,1977~1978,第8页(Monumenta Serica, 1977~1978, p.8)。米勒还分析了许慎和郑玄在认知程度和知识结构上的差异。

④ 顾涛:《段注论〈说文〉与〈仪礼〉今古文之关系析疑》,《中国经学》2012年第10期,第125~146页。

题,涵盖了以下方面:婚姻与夫妻之道、祭祀与牺牲、寺庙与朝廷、亲缘关系与等级、政府与惩治等。<sup>①</sup>很显然,许慎模仿了《白虎通义》的形制,其目的在于抨击不再研习古文文本的时人和官僚。《后汉书·徐防传》曾提及上述现象(注:徐防曾被举孝廉,担任尚书郎,他是抵制今文经学的中流砥柱):

防以五经久远,圣意难明,宜为章句,以悟后学。上疏曰:臣闻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其后诸家分析,各有异说。汉承乱秦,经典废绝,本文略存,或无章句。收拾缺遗,建立明经,博征儒术,开置太学。孔圣既远,微旨将绝,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设甲乙之科,以勉劝学者,所以示人好恶,改敝就善者也。伏见太学试博士弟子,皆以意说,不修家法,私相容隐,开生奸路。每有策试,辄兴诤讼,议论纷错,互相是非……今不依章句,妄生穿凿,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轻侮道术,开五十难以成俗……臣以为博士及甲乙策试,宜从其家章句,开五十难以试之。解释多者为上第,引文明者为高说;若不依先师,义有相伐,皆正以为非。五经各取上第六人,论语不宜射策。虽所失或久,差可矫正。诏书下公卿,皆从防言。<sup>②</sup>

黄永武的两卷本主题式研究著作《许慎之经学》考察了许慎

① 董希谦、张启俊:《许慎与〈说文解字〉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第39页。

② (南朝宋)范曄:《后汉书》,中华书局,2000,第1500~1501页。

竟说,反使全美见焉。<sup>①</sup>

不似黄永武的话题性书写,马宗霍的《说文解字引经考》则采用文本分析的方式探讨了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五经及其他上古典籍的引用。据他的统计,《说文解字》共引用《易经》78条,《尚书》159条,《逸周书》10条,《诗经》422条,《三条》2条,《礼记》145条,《春秋》181条,《国语》20条,《论语》31条,《逸论语》2条,《孝经》3条,《尔雅》28条,《孟子》8条。<sup>②</sup>

许慎的传世名作《说文解字》可视为一本解释常用字、分析复杂字词的词典性工具书,该书聚焦于字形及字义。<sup>③</sup>这是中国

① 黄永武:《许慎之经学》(两卷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72,第369页。

② 马宗霍:《说文解字引经考》,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1。

③ 读者可参见江学谦《说文解字综合研究》,台中,东海大学出版社,1970;祝敏申《〈说文解字〉与中国古文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李旭升《说文新证》(两卷本),台北,艺文印书馆,2004~2008;罗伊·安德鲁·米勒(Roy Andrew Miller)《〈说文解字〉问题研究》(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Shuo wen chieh tzu),哥伦比亚大学,1958,第98~271页(Columbia University, 1958, pp. 98~271);鲁惟一(Loewe)编著《早期中国文本》(Early Chinese Texts),美国东亚研究所出版社,1994,第429~442页,编则岳(William G. Boltz)的这篇文章堪称对《说文解字》条目内容、术语和结构最详尽的分析。

译者注:

[美]罗伊·安德鲁·米勒(Roy Andrew Miller, 1924~2014),出生于明尼苏达州的威诺娜,1953年获得博士学位,1955~1963年在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担任语言学教授,之后赴耶鲁大学任教,1964~1970年担任该校东亚和南亚语言和文学部主任,1970~1989年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任职。他还曾在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任教。他长期致力于日语、汉语和藏语的研究和教学,著有《日语和其他阿尔泰语言》、《西藏语法传统研究》、《日语的起源》、《语言和历史的起源》以及《日本的现代神话:语言和超越》等书。

255

对五经的运用,在谈及许慎对《易经》的研究及注解时,黄永武认为:

许慎为通儒,学既兼赅古今,识能臧否同异,其说易义,立言惟求其当,本不墨守一家。<sup>①</sup>

又言:

非主一家。而解字之篇,则创自从逸文学之后,乃特崇古学。是故许君之书学,于异义则博洽多方,期于愜理;于说文则笃守古学,独称孔氏。<sup>②</sup>

在黄永武看来,许慎对《诗经》的言说可谓“唯依据明确者是从”,<sup>③</sup>至于对其他经典的研究,许慎侧重于《仪礼》和《左传》;<sup>④</sup>郑玄则广泛地研读“三礼”和“春秋三传”。<sup>⑤</sup>黄永武曾将许慎与郑玄并置比较,做出以下总结:

许君异义既汇萃汉师之遗说,郑君取议又广备通儒之高论,是以许书郑驳,实兼综古今之殊旨者也。而两京坠绪,肯綮在此,学者称汉学,乃推许郑之学焉……故尔书中诸家

① 黄永武:《许慎之经学》(两卷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72,第1页。

② 黄永武:《许慎之经学》(两卷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72,第83页。

③ 黄永武:《许慎之经学》(两卷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72,第200页。

④ 黄永武:《许慎之经学》(两卷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72,第369页。

⑤ 黄永武:《许慎之经学》(两卷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72,第499页。

第一部以偏旁部首为索引的字词典，许慎细分出540个部首。<sup>①</sup>《说文解字》共包含9353个字，外加1163个重文。唐朝学者李阳冰系统研究过《说文解字》，他依据此书将自己的名字解释为“太阳下的冰”，这与他的遭遇和心境也有关，因其一直不被朝廷重用，其政治及学术观点也始终不受欢迎。徐铉（916~991）和徐锴（920~974）两兄弟穷极一生钻研《说文解字》，写下《校订说文解字》，每一卷分为两个部分，并增加反切读法。徐锴还著有《说文解字系传》，对部首和字形加以解释。清代学者段玉裁是力图横跨文本批评与注解性分析两个领域的少数学者之一，著有《说文解字注》。<sup>②</sup>

且不谈许慎的学术贡献和革新精神，他编写《说文解字》的宗旨远大于纯粹的学术，鲍则岳（William G. Boltz）曾言：

许慎之所以著《说文解字》，并不是出于语言学或词典学研究的动机。他真正的目的在于弘扬经典，向天下人昭告古文经学的合法性，并彰显自己对汉王朝的忠心，同时以确立文字语汇含义的方式为世间确立秩序。许慎所借用的方式是语文学和词典学，但探寻字词的含义却不是他学术道路的终点。<sup>③</sup>

① 对许慎生发之偏旁的探究和分析，读者可参见蒋世德《文字学：说文部首编》，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7。  
② 鲍则岳（William G. Boltz）对此问题有过十分细致详尽而深刻的分析。读者请参见鲁惟一（Loewe）编著《早期中国文本》（Early Chinese Texts），美国东亚研究所出版，1994，第429~442页。  
③ 鲁惟一（Michael Loewe）编著《早期中国文本》（Early Chinese Texts），美国东亚研究所出版，1994，第430页。

以许慎对“一”的解释为例：

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sup>①</sup>

当代学者汤可敬在《说文解字今释》一书中评价道：

惟初太始四句，不是解释一字，而是说明本书立一为首  
的哲学依据。说得十分堂皇。<sup>②</sup>

至于数字“三”，《说文解字》的解释是：

三数名，天地人之道也。<sup>③</sup>

汤可敬更是引申道：

王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于  
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  
贯三为王。<sup>④</sup>

①（汉）许慎著，（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1页。  
段玉裁将“太始”注解为“太极”，同样的释读见于徐锴《说文解字系传》，中华书局，1987，第1页。  
② 汤可敬：《说文解字今释》（两卷本）第一卷，岳麓书社，1997，第1页。  
③（汉）许慎著，（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17页。  
④（汉）许慎著，（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13~14页。

许慎在方法论上的独特性透过《说文解字》表露无遗。首先是以发音类比为策略确定某个字的基本属性。这种方式以语音元素取代了字形结构,上述运用在《说文解字》里比比皆是,如“土”与“事”,“君”与“尊”以及“酒”与“就”,等等。如:

所以就人性之善恶。<sup>①</sup>

这反映了许慎借由语音相似所进行的语汇延伸。他还引用孔子、韩非以及司马相如的话语作为佐证,只是他所征引的某些话语后人并未从古籍中寻得原文。我们可以合理推测,这些无证可考的话语出自他对古人思想的自我提炼和整合。下面再举一例,许慎对“士”的解释为“推十合一为士”,段玉裁认为许慎的解释可谓“由博返约”。但正如前文所谈及并分析的那样,许慎此处的解释也属无证可考、无迹可寻,汤可敬认为若将此归于孔子言论,则根基虚无。<sup>②</sup>

① (汉)许慎著, (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21页。充分利用双关语的词典当属刘熙的《释名》,它分为八章,包括天、地、山、河等,共计大约1500个条目,按照语音及语义分类。如:“天,显也。在上高显。”读者可参见罗伊·安德鲁·米勒(Roy Andrew Miller)的文章,收录于鲁惟一(Loewe)编著《早期中国文本》(Early Chinese Texts),美国东亚研究所出版社,1994,第425~428页。此外,读者还可参见张舜徽编《郑学丛著》(两卷本)第二卷,齐鲁书社,1984,第420~611页;读者也可参见[美]许世英(Axel Schuessler)《ABC上古汉语词源词典》(ABC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Old Chinese),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7(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第507~508页。

② 汤可敬:《说文解字今释》(两卷本)第一卷,岳麓书社,1997,第59页。

许慎在《说文解字》序言里阐明了著此书的目的和宗旨,<sup>①</sup>如下:

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sup>②</sup>

这澄清了他的书写动机,也表明他的书写行为与经学、王权及上古文化密切相关。蒂默瑟·欧·内尔(Timothy O'Neil)曾将这篇序言视为“正名”之作。“正名”一词出自孔子之口,后被荀子发扬,如下: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

① 许慎《说文解字》序言部分曾被翻译成英文,读者请参见瑟恩(K. L. Thern)译《〈说文解字〉“序”》:中国第一部全面而综合的词典》(Preface of the Shuo-wen Chieh-tzu: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Chinese Dictionary),威斯康星大学,1966,第8~18页(Madison,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66, pp. 8-18);蒂默瑟·欧·内尔(Timothy O'Neil)《许慎年表:对〈说文解字〉序的另一种解读》(“Xu Shen's Scholarly Agenda: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Preface to the Shuowen Jiezi”),《美国东方学会》2013年总第133期,第413~440页[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33) 2013, pp. 413-440]。读者还可参见此书的第429~478页,从而了解法语和德语版本,以及其他英语版本。鄢承铨:《说文解字序讲疏》,陈新雄、于大成编《文学论文集》,台北,木铎书局,1976,第51~194页。

② (汉)许慎著, (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15~21页。

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 无所苟而已矣。<sup>①</sup>

“正名”论是孔子留给后人的思想遗产, 这一观点和论调激发了荀子, 他因而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故王者之制名, 名定而实辨, 道行而志通, 则慎率民而一焉。故析辞擅作名, 以乱正名, 使民疑惑, 人多辨讼, 则谓之大奸。其罪犹为符节度量之罪也。故其民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 故其民惑; 惑则易使, 易使则公。其民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 故壹于道法, 而谨于循令矣。如是则其逆长矣。逆长功成, 治之极也。是谨于守名约之功也。今圣王没, 名守慢, 奇辞起, 名实乱, 是非之形不明, 则虽守法之吏, 诵数之儒, 亦皆乱也。若有王者起, 必将有循于旧名, 有作于新名。然则所作为有名, 与所缘以同异, 与制名之枢要, 不可不察也。<sup>②</sup>

根据孔、荀二人的理论, 正名是社会秩序的基础, 是王叔得以稳固的根基。这一观念在荀子那里发挥到了极致, 盖因荀子所生活的年代时局动荡, 礼崩乐坏, 人心惶惶。既然名实应相符, 恰当的名称映射出恰当的事物和现实, 故而语义实践与物象及时

① (清) 刘宝楠注《论语正义》, 中华书局, 1990, 第108页。

② 王先谦:《荀子集解》, 中华书局, 1988, 第275~276页。此书曾被诺布罗克(Knoblock)翻译成英文, 读者请参见诺布罗克(Knoblock)译《荀子著述的翻译和研究全集》(Xunzi: A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the Complete Works),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94, 第128页。

事是紧密相连的, 名称可以反映一个时代的样貌。

关于“正名”的问题,《说文解字注》里有这么一段文字:

书或不正, 辄举劾之。今虽有耐律, 不课, 小学不修, 莫达其说久矣。<sup>①</sup>

可见, 对于名称的诠释并未被纳入孩童启蒙教育之中。而从许慎的观点出发, 这种字词释义方面的训练本应被纳入。

清代学者在“正名”观念下的诠释学框架之中突出强调了“小学”这一范畴, 欧·内尔(O'Neil)将之翻译为“基础教育”, 他援引了戴震(1724~1777)、段玉裁(1735~1815)、王念孙(1744~1832)以及朱骏声(1788~1858)的观点, 认为孔子及荀子的正名理论可被运用于许慎的文字观之上。<sup>②</sup>

在此, 欧·内尔(O'Neil)实际上将探讨引入了更深刻的层面, 他认为许慎对正名观的评价与文字书写形式及字体的历史嬗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诚然, 古文作为一种字样形态, 出现在孔子和左丘明的书写之中。任何由此发展而出的晚近字体都已经脱离了古文的生存语境, 正如《说文解字注》中所言:

① (汉) 许慎著, (清) 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第13页。  
蒂默瑟·欧·内尔(Timothy O'Neil):《许慎年表: 对〈说文解字〉序的另一种解读》(“Xu Shen's Scholarly Agenda: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Preface to the Shuowen jian”),《美国东方学会》2013年总第133期, 第434页[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33) 2013, p. 434]。

② (汉) 许慎著, (清) 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第414~417页。

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也。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自尔秦书有八体……<sup>①</sup>

上述看法似乎是有道理的，蒂默瑟·欧·内尔（Timothy O'Neill）总结道：

尊重并研究古文经学文本是十分有必要的，无论是在宫廷中还是在民间私学。古文文本包含了极其重要的信息，它暗含了古今之间的联系，故而对朝廷政治纲领也有所启示，使人们试图回归理想中的往昔社会。<sup>②</sup>

①（汉）许慎著，（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8-11页。瑟恩（K. L. Thern）译《〈说文解字〉“序”：中国第一部全面而综合的词典》（*Postface of the Shuo-wen Chieh-tzu: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Chinese Dictionary*），威斯康星大学，1966，第17页（Madison,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66, p. 17）。

② 蒂默瑟·欧·内尔（Timothy O'Neill）：《许慎年表：对〈说文解字〉序的另一种解读》（“Xu Shen's Scholarly Agenda: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Postface the Shuowen jiezi”），《美国东方学会》2013年总第133期，第425页[*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33) 2013, p. 425]。

我在此愿引用酈承铨的话作为总结，在他看来，即使人们以一日一字的速度钻研《说文解字》，那么穷极一生也还是无法将此书研究透彻。<sup>①</sup>他进而在《说文解字序讲疏》一书中这样写道：

《说文解字》的价值不可估量，倘若没有这本著作，那么先秦时期的很多文字以及书写样态就不可能得以留存下来。难能可贵的是，《说文解字》还保留了甲骨文、金文及篆书，后世可借由这本书了解上古文字的语音及字体结构。同时，《说文解字》还有社会学及神话学层面上的价值，读者可以透过文字进而窥见远古时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以及文化。<sup>②</sup>

① 酈承铨：《说文解字序讲疏》，陈新雄、于大成编《文字学论文集》，台北，木铎书局，1976，第51页。

② 瑟恩（K. L. Thern）译《〈说文解字〉“序”：中国第一部全面而综合的词典》（*Postface of the Shuo-wen Chieh-tzu: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Chinese Dictionary*），威斯康星大学，1966，第4页（Madison,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66, p. 4）。关于《说文解字》的训诂学意义和价值，读者请参见宋永培编《说文与训诂研究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13。

### 第三节 郑玄与“通学”

#### 一 历史评价

依我之见,郑玄(127~200)乃清代之前最伟大的经学家和思想家。他在做学问的深度和广度上可与朱熹(1130~1200)媲美,戴震(1724~1777)就曾将此二人相提并论,称二人皆为集大成者。<sup>①</sup>从现存史料来看,郑玄一生逍遥自在,怡然自得,他虽任朝廷官职,但所任职位为闲职,并无实际政务,因而无案牍之劳形,故能沉溺于浩瀚的古籍之中,尽享书趣。东晋之后,郑玄的学说衰微于中国南方,但在北方地域颇受欢迎,盖因北方学界重视文本注疏,而非哲理诠释。到了清代,郑玄的名声可谓威震山谷,因为清代的学术氛围和清人的学术传统与郑玄甚为相投,皆以语文学的路径切近文本。清人凌廷堪(1757~1809)将郑玄与许慎和服虔同视为汉代伟大的汉学家,认为他们成就了汉代经学的辉煌;顾炎武(1613~1682)则将郑玄、董仲舒和王通(584~617)三人并称为汉代的大儒,认为他们为后世奠定了学术道路。在此,我愿征引凌廷堪的《后汉三儒赞并序》以及顾炎武之长诗《述古》中关于郑玄学术成就的部分,如下:

#### 后汉三儒赞并序<sup>②</sup>

若夫许君叔重、服君子慎、郑君康成,皆东汉之冠冕,

① (清)戴震:《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第158页。

② (清)凌廷堪:《校礼堂文集》,中华书局,1998,第87页。

洵儒林之翘秀,或长于小学,或精于春秋。其大者则政在六经,学通七纬,彬彬乎!郁郁乎!

#### 述古<sup>①</sup>

……

六经之所传

训诂为之祖

仲尼贵多闻

汉人犹近古

礼器与声容

习之疑可睹

大哉郑康成

探賾靡不举

六艺既该通

百家亦兼取

至今三礼存

其学非小补<sup>②</sup>

……

清代经学家在治学方法及研究态度上多受郑玄的影响和激励,并借鉴其学术观点,很多清人的著作大篇幅地引用郑玄的话语,甚

① (清)顾炎武:《顾亭林诗集汇注》(两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1006~1014页。

② 此处暗示了君子对社会的影响。孟子曰:“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

至在为自己或私人藏书阁取名号时也采用郑玄的某些言语。王昶（1725~1806）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郑学斋”，孔广森（1753~1787）则将书斋取名为“仪郑堂”，周中孚（1768~1831）将自己最重要的一本著作取名为《郑堂读书记》，李慈铭（1830~1895）号郑盦，吴大澂（1835~1902）号郑盦，江藩（1761~1830/1831）号郑堂。戴震（1724~1777）拜访过郑学斋，并就为何王昶将书斋取名为“郑学斋”做过一番解释，读者可参见《郑学斋记》。<sup>①</sup>

## 二 生平 and 著作

郑玄与郑兴和郑众有着些许亲缘关系，故而也算得上生于名门。《后汉书·郑玄传》在书写其生平著作的同时，也阐述了汉代口授经学的传统，这在拙著《中国经学史》第一卷里也有所提及。下面我将呈上《后汉书·郑玄传》中的节选，如下：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玄少为乡啬夫，得休归，常诣学官，不乐为吏，父数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会融集诸生考论图纬，闻玄善算，乃召见于楼上，玄因从质诸疑义，问毕辞归。融喟然谓门人曰：

①（清）戴震：《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第177页。

郑生今去，吾道东矣。<sup>①</sup>

一些其他的早期资料则表明郑玄在答完所有问题之后并未立即离开，而是又在马融门下学习了七年之久，领悟了其个人精髓才离开。<sup>②</sup>因此根据现存的这些纷繁复杂而又互相矛盾的史料，我们并不能确定郑玄究竟从马融那里习得了多少治学方法和理念，也无法知晓郑玄获取知识的渠道是否唯有马融那位高徒的口授。我们或许可以简单地将郑玄的求学经历总结如下：他最开始求学于当地私塾，后四处拜师，渴望求得“亲师”，而后他在洛阳进入官学，这段到处求学的经历令他受益匪浅，让他吸收了不同学派的养分，取百家之长，最后他拜在了名师马融门下；在马融门下的研习期间，他通读经典，试图挖掘文字背后蕴藏的深层次含义，并将文本内容运用于道德教化。他与申屠蟠、荀爽被视为儒家道德准则的发扬者。<sup>③</sup>郑玄受教于马融高徒的经历反映了当时口授

①（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2000，第1207~1213页。读者还可参见孙星衍、阮元编《郑司农年谱》，北京图书馆编《汉晋名人年谱》（三卷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第463~554页；王利器：《郑康成年谱》，齐鲁书社，1983；Mieczyslaw Jerzy Kustler, "Deux biographies de Tch'eng Huan," *Rocznik Orientalistyczny* 26.1 (1962): 23-64; Mark Laurent Asselin, "The Lu-School Reading of 'Guanju' As Preserved in an Eastern Han Fu,"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7 (1997); 姚兴中编《儒学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第814~816页；Rafé de Gasparis,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Later Han to the Three Kingdoms*, 23-220 A.D.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7), pp. 1126-1128.

②读者可参见孙星衍、阮元编《郑司农年谱》，北京图书馆编《汉晋名人年谱》（三卷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第483~489页。

③（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2000，第2057页。申屠蟠的传记则见于（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2000，第1750~1754页。《后汉书·申屠蟠传》将之刻画为“隐居精学，博贯五经，兼明图纬”，他与荀爽、郑玄同为188年被召为宫廷学者的14位经学家之一，但他婉言谢绝了。

经学的情状和传统，我们可以合理推断并假设这样的传授是依照某种仪式性的规范来进行的。马融未曾想到或始料未及的是，以这种方式培养出的郑玄竟然如此优秀，面对自己的设问竟能对答如流，他居然成为自己门下最杰出的弟子之一。

郑玄作为经学家的历程与成就如下：

玄自游学，十余年乃归乡里。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及党事起，乃与同郡孙嵩等四十余人俱被禁锢，遂隐修经业，杜门不出。时任城何休好公羊学，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玄乃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兴之后，范升、陈元、李育、贾逵之徒争论古今学，后马融答北地太守刘瓛及玄答何休，义据通深，由是古学遂明。<sup>①</sup>

关于郑玄的逝世和遗产如下：

五年春，梦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岁在辰，来年在巳。既寤，以箴合之，知命当终，有顷寢疾……疾笃不进，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遗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尝受业

①（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2000，第1207页。读者请参见拉弗·德·克里斯皮涅（Raïe de Crispigny）《自汉代晚期至三国时代的文献学词典》（*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Later Han to the Three Kingdoms, 23-220 AD*），布瑞尔出版社，2007，第776页（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7, p. 776）。

者，缀经赴会千余人。门人相与撰玄答诸弟子问五经，依论语作郑志八篇。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著天文七政论、鲁礼禘祫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玄质于辞训，通人颇讥其繁。至于经传诂训，称为纯儒，齐鲁间宗之。

范晔对郑玄一生的总结如下：

论曰：自秦焚六经，圣文埃及。汉兴，诸儒颇修文艺；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詭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政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经训，而长于玄，常以为仲尼之门不能过也。及传授生徒，并专以郑氏家法云。

### 三 总论

当评价郑玄的学术贡献时，我们或许也可采用李威熊总结马融成就的方式，甚或一些内容，只是郑玄技高一筹。皮锡瑞（1850~1908）曾在《经学历史》里褒扬郑玄，称赞他将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融为一体，曰：

是郑注兼采今古文也。<sup>①</sup>

虽然郑玄的学术理念偏向古文经学,但他博采众长,对今文经学文本同样了如指掌,故而后人称他为“通学”之才,也就是说,他通读各类书籍,并能融会贯通。<sup>②</sup>此外,他还总能将词章之间的微言大义运用于人情世故、礼仪规范以及典章制度中。这种灵活而切实的应用可见于他的各类著述,在他对《诗经》所作的注疏里尤为明显。<sup>③</sup>

我将在下文列出唐朝之前以及初唐时期所使用的称谓评注的名词。此处,我会引用王充的观点来说明经、传及其他注释类文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如下:

圣人作其经,贤者造其传,述作者之意,采圣人之志,故经须传也。俱贤所为,何以独谓经传是,他书记非?彼见经传,传经之文,经须而解,故谓之是。他书与书相违,更造端绪,故谓之非。若此者,则是于五经。使言非五经,虽是不见听。使五经从孔门出,到今常令人不缺失,谓之纯壹,信之可也。今五经遭亡秦之奢侈,触李斯之横议,燔烧禁防,伏生之休,抱经深藏。汉兴,收五经,经书缺失而不

明,篇章弃散而不具。晁错之輩,各以私意分拆文字,师徒相因相授,不知何者为是……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可观读以正说,可采掇以示后人。后人复作,犹前人之造也……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诸子尺书,文明实是。说章句者,终不求解和明,师师相传,初为章句者,非通览之人也。<sup>①</sup>

王充不仅解释了传的功用,还阐述了经传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其注释性文体的特点,同时也说明了如何对经书原文进行较为精准的解读,这篇文章因此而闻名,也常被后人所引用。应劭(约140~206)曾著《风俗通义》,记载汉代的习俗、礼仪以及特殊的人文景象,在此书中作者同样也介绍了传注的传统与各学派之间的分殊和争斗。<sup>②</sup>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应劭把自己的书视为一种独特的传注,曰:

凡十一卷,谓之风俗通义,言通于流俗之过谬,而事该之于义理也。<sup>③</sup>

读者须知,“义理”是中国古代文学评论中的一个常用术语,《汉书·刘歆传》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① 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第135~136页。

② 王葆玟:《今古文经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164~168页。关于以郑玄为代表的“通学”之发展,读者可参见杨广伟《论郑玄通学产生的历史原因》,收录于林庆彰编《中国经学史论文选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第351~363页。

③ 梁锡铸:《郑玄以礼笺诗研究》,学苑出版社,2005。

① (汉)王充:《论衡》,岳麓书社,2006,第276~277页。

② 《风俗通义校注》(两卷本)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第1~4页。

③ 《风俗通义校注》(两卷本)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第4页。

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sup>①</sup>

吕思勉（1884～1957）认为中国古典学术传统书面化的基本呈现形式有以下四种：经、传、说与记。前两种属于文本创作，作者多为古代圣贤；后两种则为记录下的文字，但同样基于圣贤的口述。<sup>②</sup>基于上述观点，下文中呈现的表格包含了晚唐及之前人们所使用的注释体例，涵盖了吕思勉所区分的两种形式。一般而言，传意味着将经师口授给弟子的话语转录为书面文字，我们也可理解为一种将口头话语转化为学术语言的方式。<sup>③</sup>因此，它标志了口述与书写这两种语言形式的结合，后人亦能从现存文本中以一种想象的方式还原当时的口授情形。表7-2便为注疏体例：

表 7-2 注疏体例一览

| 文本形式 | 基于口头传统的书面化形式 |
|------|--------------|
| 传    | 传            |
| 记    | 记            |
| 注    | 说            |
| 解    | 章句           |

①（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第1967页。  
②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经传说记》，为“民国丛书”系列中的一本，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第1～161页。  
③关于经书评注的背景，读者可参见蔡任真（Yen-zen Tsai）的博士学位论文《经与传：汉代儒家经典的界定》（*Ching and Chuan: Towards Defining the Confucian Scriptures in Han China*），哈佛大学，1992，第24～57页。

续表

| 文本形式 | 基于口头传统的书面化形式 |
|------|--------------|
| 疏    | 论            |
| 诂    | 问            |
| 训    | 答            |
| 释    | 议            |
| 笺    | 驳            |
| 谱    | 述义           |
| 赞    |              |
| 叙    |              |
| 图    |              |
| 目录   |              |

对照表7-2所列出的体例，我们可知郑玄的书写几乎涵盖了以上22种体例，除了记、解、疏、训、释与说这六种形式未被包含。<sup>①</sup>

总的说来，汉代经学家采取了四种主要的注解注释方式，如下：（1）以经释经；（2）以字释字，包括同音字和字形相近的字；（3）引用其他经典的注解；（4）结合历史和文化背景。<sup>②</sup>张舜徽（1911～1992）对郑玄治学方法的分析反映了其治学路径的广度和技巧的多样性，尽管很难分辨哪些方法为郑玄始创或首用，但可以肯定的是，颇多治学方法滥觞于郑玄。回望历史，郑玄无疑是整个中国经学史上最重要，也是最具影响力的经学家之一。

① 许抗生等：《中国经学史·两汉卷》，汤一介、李中华编著《中国经学史》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474～476页。陈家骥曾全面整理并详细分析郑玄的经典学术著作，读者可参见陈家骥《郑康成著述考》，《文学年报》1936年第2期，第147～178页；李云光《郑康成述考》，《联合书院学报》1962年第1期，第1～59页。  
② 马宗霍：《中国经学史》，中华书局，1990，第56～57页。

第七章：后世的缅怀与纪念（第507~563页）

附录：郑玄年谱（第564页）

郑玄研究综述（古代篇）（第565~571页）

郑玄研究综述（二十世纪）（第572~579页）<sup>①</sup>

2. 王振民编《郑玄研究文集》（齐鲁书社，1999）

这本研究文集包含21个部分，并同样附有翔实的附录。读者不仅能够从这本书中获知数世纪以来各路学者对郑玄的诸种研究，还可获知郑玄弟子的创新性继承以及学术界对整个郑学门派的研究。

3. 张舜徽：《郑学丛著》（齐鲁书社，1984）

这本著作以典型例证分析了郑玄的注释学，各章节标题如下：

第一章：郑玄学术成就的总体评价（第1~38页）

第二章：郑玄对经典文本的修订（第39~74页）

第三章：郑玄的文本批评（第75~158页）

第四章：郑玄学派的历史传承（第159~194页）

第五章：郑玄训诂汇释（第195~420页）

第六章：演释名（第411~610页）

此外，以下也是重要的研究性文本，读者可参见：陈品卿《尚书郑氏学》（博士学位论文，台湾师范大学，1977）；陈铁凡《孝经郑注校证》（台北，编译馆，1987）；冯浩菲《郑氏诗谱订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黄焯《毛诗郑笺评议》（武汉大

<sup>①</sup> 读者可参见我撰写的《西方郑玄研究述评》，《历史文献研究》2010年第29期，第104~109页。

学出版社，2008）；金谷治编《唐抄本郑氏注论语集成》（东京书社，1978）；李云光《三礼郑氏学发凡》（1966年初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再版）；史应勇《郑玄通学及郑王之争研究》（巴蜀书社，2007）；王寿南、陈水逢编《郑玄之藏纬学》（台北，商务印书馆，1974）；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文物出版社，1991）；王应麟编《周易郑注》，收录于王云五编《丛书集成简编》（台北，商务印书馆，1961）；王应麟编《尚书郑注》，收录于王云五编《丛书集成简编》（台北，商务印书馆，1961）；文幸福《诗经毛传郑笺辨异》（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杨天宇《郑玄三礼》（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 结论：方法论的革新者与语文学的拓展

文献学领域的学术原则在于研究作者、文本内容以及思想空间。文本批评同样涉及如何确定作品的真伪以及如何筛选出同一作品的最佳版本。语文学将读者的视线带入微观世界，深入字里行间；注释学则将读者的视线带入更为广阔的天地，从而得以通晓段落甚或整部作品的内涵。宏大的注释学旨在研究作品的各个方面，它包含了语文学、文献学及注释学等在内。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上述学术方法论的发展和进步得益于古文经学派严丝合缝的考证以及一丝不苟的学术态度，古文经学派对文本的细致检阅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今人可以从他们的研究成果中获悉上古时期的某些特定的历史及物象名称，尤其是那些与礼仪相关的知识。经典古籍所隐藏的信息被古文经学家以一种抽丝剥茧的方式逐层揭示出来，这些信息原本隐藏于语

第七章：后世的缅怀与纪念（第507～563页）

附录：郑玄年谱（第564页）

郑玄研究综述（古代篇）（第565～571页）

郑玄研究综述（二十世纪）（第572～579页）<sup>①</sup>

2. 王振民编《郑玄研究文集》（齐鲁书社，1999）

这本研究文集包含21个部分，并同样附有翔实的附录。读者不仅能够从这本书中获知数世纪以来各路学者对郑玄的诸种研究，还可获知郑玄弟子的创新性继承以及学术界对整个郑学门派的研究。

3. 张舜徽：《郑学丛著》（齐鲁书社，1984）

这本著作以典型例证分析了郑玄的注释学，各章节标题如下：

第一章：郑玄学术成就的总体评价（第1～38页）

第二章：郑玄对经典文本的修订（第39～74页）

第三章：郑玄的文本批评（第75～158页）

第四章：郑玄学派的历史传承（第159～194页）

第五章：郑玄训诂汇释（第195～420页）

第六章：演释名（第411～610页）

此外，以下也是重要的研究性文本，读者可参见：陈品卿《尚书郑氏学》（博士学位论文，台湾师范大学，1977）；陈铁凡《孝经郑注校证》（台北，编译馆，1987）；冯浩菲《郑氏诗谱订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黄焯《毛诗郑笺评议》（武汉大

学出版社，2008）；金谷治编《唐抄本郑氏注论语集成》（东京社，1978）；李云光《三礼郑氏学发凡》（1966年初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再版）；史应勇《郑玄通学及郑王之争究》（巴蜀书社，2007）；王寿南、陈水逢编《郑玄之文献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74）；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文物出版社，1991）；王应麟编《周易郑注》，收录于王五编《丛书集成简编》（台北，商务印书馆，1961）；王应麟《尚书郑注》，收录于王云五编《丛书集成简编》（台北，商务印书馆，1961）；文幸福《诗经毛传郑笺辨异》（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杨天宇《郑玄三礼》（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 结论：方法论的革新者与语文学的拓展

文献学领域的学术原则在于研究作者、文本内容以及思想间。文本批评同样涉及如何确定作品的真伪以及如何筛选出同一作品的最佳版本。语文学将读者的视线带入微观世界，深入字行间；注释学则将读者的视线带入更为广阔的天地，从而得以晓段落甚或整部作品的内涵。宏大的注释学旨在研究作品的各方面，它包含了语文学、文献学及注释学等在内。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上述学术方法论的发展和进步得益于文经学派严丝合缝的考证以及一丝不苟的学术态度，古文经学对文本的细致检阅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今人可以从他们的研究成果中获悉上古时期的某些特定的历史及物象名称，其是那些与礼仪相关的知识。经典古籍所隐藏的信息被古文经学家以一种抽丝剥茧的方式逐层揭示出来，这些信息原本隐藏在

<sup>①</sup> 读者可参见我撰写的《西方郑玄研究述评》，《历史文献研究》2010年第29期，第104～109页。